

忿激派运动

(苏) Я·М·扎赫尔著

申晨星 译

栾德济 校

5.41

吉林大学出版社

忿激派运动

(苏) Я·М·扎赫尔 著

申晨星 译

栾德济 校

吉林大学出版社

Я·М·ЗАХЕР
ДВИЖЕНИЕ БЕШ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61

忿 激 派 运 动

〔苏〕 Я·М·扎赫尔 著

申 晨 星 译

栾 德 济 校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32开 6.5印张 140,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

统一书号：11323·10 定价：1.15元

雅·米·扎赫尔和他的 《忿激派运动》

端木正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申晨星同志译的雅·米·扎赫尔的《忿激派运动》一书，我为这位苏联的法国史名家的名著能介绍到我国来感到高兴。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扎赫尔(1893—1963年)是苏联老一辈的法国革命史专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已从大学法学院毕业，并执行过律师业务。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十月革命后在内战中立过战功。1920年再入彼得格勒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当时法国史大家尼古拉·加列耶夫的入室弟子。1921年扎赫尔开始发表史学文章，撰文评过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论过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雅克·鲁等历史人物。1925年他的几本小册子受到法国革命史一代权威阿尔贝·马迪厄的注意，在“法国革命史”杂志上写了书评，从此扎赫尔博得国外史学界的重视。1923年加列耶夫逝世，扎赫尔接替老师讲授近代史课，晋升为讲师。1927年他到法国结识了马迪厄，钻研了法国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文献。他和西欧史学界的交往（其中包括英国牛津大学的汤普森教授）有助于他归国后更加决心继续填满西方史学界的薄弱点。他的《肖梅特，十八世纪的反宗教主义者》（1930年）和《法国大革命与教会》（上、下两册，

1930年和1931年)使他蜚声国际史坛。而扎赫尔毕生功力最深的领域始终是“忿激派”运动。

1925年他出版了《忿激派史论集》，当即博得马迪厄的好评，以后他又接连发表了几篇论“忿激派”人物的文章。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1930年他综合写成《忿激派》一书。正当他教学和科研活动进入旺盛时期，将要作出更大贡献的岁月里，不幸，到三十年代后期，扎赫尔遭遇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他被赶下了讲坛，退出了史坛，身陷囹圄达十六年之久。直到1956年他才完全恢复政治名誉，回到母校列宁格勒大学任教。他晚年的教学与科研仍然集中在法国大革命史，更加精力充沛地深入研究“忿激派”运动。申晨星同志译为汉文的《忿激派运动》，就是1961年增订重版的1930年著作，仍然是全面论述“忿激派”运动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专著。1930年以前，各国史学家研究“忿激派”都从马迪厄的有关著作出发，此后法国的莫里斯·杜曼著有雅克·鲁的传记，德国的马尔科夫也曾致力研究雅克·鲁，扎赫尔以自己的新心得兼收西欧同行研究的成果，全面修订1930年旧作，增补改写成为此书。

从扎赫尔著作的初版到新版之间，不仅有关史料的出现有所增长，有关“忿激派”的历史地位和评价也经史学界深入讨论，产生新的看法。二次大战后，自从乔治·勒费弗尔及其弟子们着重指出革命政府与人民运动日益脱节，他们研究雅各宾专政就抓住这种现象为主轴，因此深入研究“忿激派”就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扎赫尔此书的第一章关于史学发展部分就考虑到这些新的重要性；在此书的二至四章里，扎赫尔相继研讨了“忿激派”的社会基础和行动前提，他们活动的演进各阶段；他们失败的原因以及在法国革

命史上的重要性。

由于要保持一部专著各章节之间的平衡，也许由于篇幅的限制，扎赫尔并没有将他研究某些人物的心得，尤其是几位次要人物的情况，全部写入此书。他省略了不少细节，第三章描述事实经过往往只略述梗概，但较之马迪厄、杜曼热、索布尔、马尔科夫等名家都更为细致，而对“忿激派”的出现这一复杂历史现象总的分析更为深刻。因此，读者要了解扎赫尔研究“忿激派”的贡献，还要选读他1958年以后发表的几篇文章（其中多数已译成法文发表）。马尔科夫主持翻译扎赫尔此书的德文版时，就增进了扎赫尔著论瓦尔勒、勒克莱尔和拉孔布等三篇文章。

扎赫尔承认他的这部新版也还不是研究“忿激派”的定论，这是科学的态度，不仅是诚恳的谦虚。由于历史文献的不足，某些历史细节可能以后也很难完全阐明。但是扎赫尔已经点出今后研究的途径。他有根据说“忿激派”并不具有政党的性质，他同样有根据肯定他们是无套裤汉战士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形成一个有自己主张的集团，有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纲领，虽然还相当模糊，然而他们已不同于广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扎赫尔也没有过份地推崇“忿激派”，而是恰如其份地分析在当时经济条件下的阶级实况，这种情况的含义；他也指出“忿激派”的活动范围有限，政治视野不广，以及他们在组织上的弱点。扎赫尔对“忿激派”有热烈的思想感情，但决未因此影响他科学的治学态度。

晚年扎赫尔寓居在列宁格勒的郊区，每次上课要乘一小时的火车，这并不足以影响他培养学生的热情。他有过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他恢复了和各国同行专家的广泛联系。1963年3月，扎赫尔与世长辞，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手

稿。各国法国史学者纷纷著文沉痛悼念。英国的鲁德、罗斯和科布三人合写的悼文中追念从未谋面的异国忘年之交。这位苏联前辈学者通信极勤，详细答复年轻的外国史学家提出讨论的问题。他很想再游英、法两国，但是到了1962年体力日衰，整个冬天足不出户，他想赴英、法继续研究并会晤通信多年的同行，这个愿望无从实现。索布尔等在悼文中都追述在和扎赫尔通信中得益良多。

扎赫尔在我国史学界也不完全是陌生的。五十年代末他和北京大学杨人楩教授有过通信往来，杨先生曾将所著《圣鞠斯特》寄赠扎赫尔，我相信，如果清理杨先生的俄文遗书，可能发现扎赫尔的赠书。1960年，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受教于扎赫尔教授的吴美芬同志回国时，他托吴美芬同志回国后向杨先生致意，并说杨先生如需英、法、德、俄文史料或参考书，他均可寄赠。由于吴美芬同志没有机会见到杨先生，这个口信由我代为转达。扎赫尔对选修他的课的中国学生关怀备至。吴美芬同志回国后仍然时常接到他的来信和赠书，尽管当时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起了变化。扎赫尔的文章也相继译成汉文。他的《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后的让·瓦尔勒》一文由吴美芬同志译出，发表在中山大学出版的《世界近代史参考资料选集》第二辑(1964年)。他的《关于‘疯人派’，〔即‘忿激派’——笔者〕观点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前时期的意义问题》译文辑入《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

我在一篇史学评介中曾评述“文革”前十七年我国介绍苏联史学的成果，认为苏联史学界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有悠久的传统，而我国所已译出的三本书未经精选，“回顾起

来，殊觉可憾”。^①现在这件憾事得到了一次补偿，扎赫尔这本书就是值得翻译介绍到我国的一本专著，即使晚了二十多年，仍然是我国史学界一项可庆贺的成就。

^① 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法国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年在社会小组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究，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152页。

目 录

第一章	“忿激派”的史学研究……………	(1)
第二章	“忿激派”兴起的社会基础和前提……………	(20)
第三章	“忿激派”活动的各阶段……………	(58)
	“忿激派”同吉伦特派的斗争……………	(59)
	“忿激派”对雅各宾派活动的批评……………	(77)
	“忿激派”的失败……………	(106)
第四章	“忿激派”运动的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	(144)
	“忿激派”世界观的特点……………	(144)
	组织上的软弱性……………	(170)
	“忿激派”运动的历史意义……………	(183)

译者后记

第一章 “忿激派” 的史学研究

(I)

直到 20 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史学还几乎避而不谈“忿激派”运动。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当时史学研究著作仅仅是由一些贵族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写的，而这些人最感兴趣的是，如果不能完全抹煞（这是办不到的），那末也要尽可能地削弱人民群众在 1789—1794 年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不难理解，所有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史学，除了罕有的例外，都只是讲议会史，而有意识地把城乡人民群众及其最主要的领袖“忿激派”和巴贝夫摒于视野之外。

19 世纪史学的这一共同特征在最早研究 1789—1794 年革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米涅和梯也尔身上就充分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尽管他们也承认在这次革命期间存在着阶级斗争，但仅仅把它视为整个“第三等级”同封建主之间的斗争，而绝非“第三等级”内部的斗争。如所周知，被马克思称之为“金融贵族”的那部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于证明，必须把大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而在复辟王朝时期部分丧失的革命成果归还给他们。自然，他

们把资产阶级本身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提到首位，而竭力贬抑人民群众的作用。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米涅连一次也没有提及“忿激派”，而梯也尔只是顺便提及过这个派别的个别代表人物。只有一处例外，这就是谈到1793年6月发生的“忿激派”同雅各宾派之间的冲突的地方^①，作者在这里是同情雅各宾派的。

米什勒与他们不同，他代表三、四十年代仇视路易·菲力普制度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业资产阶级为取得政权而同金融贵族进行斗争，他们在这—斗争中准备借助于工人阶级，同时又力图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他们给自己戴上“爱人民”的假面具，做为欺骗的手段，这种情况在米什勒对1789—1794年革命的全部阐述中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米什勒在自己多卷本革命史著作中似乎对人民群众及其领导者们表现好感，以动人的笔调描写巴黎和其他城市平民群众因物价腾贵和饥馑所受痛苦，试图恢复扎克·卢及其同志们的名誉。他说：扎克·卢“虽然是一位狂热者，但却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②然而，他对“忿激派”的“好感”，仅仅在于把这种“好感”作为抹煞被剥削阶级同剥削者阶级之间根本利害冲突的手段。列宁的一段指示完全适用于米什勒：“无论何时何地，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过时的等级束缚和其他中世纪制度都是为了全体‘人民’（因为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当时还不够尖锐）……”^③

米什勒知道，“忿激派”不主张阶级和平，而坚持“穷人”必须对“富人”进行革命斗争，尽管不是始终一贯的；因而他无法掩饰自己对他们的敌视态度。这就不难理解，读者在看到米什勒对扎克·卢肯定评价同时，还能找到对“忿激派”竭力贬损的批评，诸如，扎克·卢是疯子(un furieux)^④

和滑稽可笑的人物^⑤，勒克莱尔是“酷嗜血腥、死亡和破坏的暴徒”^⑥，而瓦尔勒则是“一个无聊的人，只能耍嘴皮子”^⑦。

米什勒之所以对“忿激派”持骑墙态度，是因为他是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者，这个阶级深受“金融贵族”经济政策之害。这个工业资产阶级站在反对路易·菲力普政府的立场上，并寻求尚未十分成熟的工人阶级的支持。1848年革命以后，他们掌握了政权；历史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巴黎公社的范例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统治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这时，法国大工业资产阶级便从有条件地辩护资产阶级大革命转向不加区分地谴责一切革命。在1871年巴黎公社直接影响下撰写《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的伊波里特·泰诺就持这种立场。泰诺谴责整个1789—1794年革命时，用同一调子攻击18世纪末大革命舞台上的所有派别和所有活动家，包括从斐扬派到巴贝夫。对他来说，罗伯斯比尔和马拉等人是“第一流的蛊惑家”，而札克·卢和其他的“公社领袖和科德利埃派”只不过是“第二流的蛊惑家”。^⑧他鄙夷地称瓦尔勒及其同志为“恶棍”、别人手中的玩偶，并一贯强调他们是完全不知名的人。^⑨

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在整体上赞成资产阶级大革命，特别赞成雅各宾派政策，就连他们，对“忿激派”也没有好的看法。如所周知，雅各宾派给予贵族和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打击平民群众及其领导者“忿激派”，虽然程度轻得多。小资产阶级史学家们毫无例外地为雅各宾派特别是为罗伯斯比尔辩护，也直言不讳地为雅各宾派对待“忿激派”的政策进行辩护，把后者说成是反革命的代理人。

例如，19世纪中叶法国史学界中这一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路易·勃朗就断言，1789—1794年革命的真正领袖乃是罗伯斯比尔，而“忿激派”不过是“虚构的领袖”，实际上的反革命代理人。^⑩

路易·勃朗把“忿激派”1793年3月的第一次发动就解释为反革命分子挑拨的结果。

他猛烈攻击“忿激派”对1793年宪法的不满和1793年6月的发动，强烈抨击札克·卢，把6月末的粮食骚动归咎于“忿激派”的挑衅，欣赏雅各宾派对“忿激派”发动的迫害。

路易·勃朗的同时代人、另一位小资产阶级法国革命专家阿米里，是三卷本《罗伯斯比尔传》和两卷本《圣茹斯特传》的作者，他也同样评论“忿激派”。在阿米里看来，

“忿激派”是“一些嗜好无秩序的革命者……”，他们象王党分子一样危害革命。他强调说，正是“这类人始终妨碍民主的最终确立”。^⑪

最著名的右翼社会党历史学家、第一次大战前第二国际最大首脑之一让·饶勒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路易·勃朗和阿米里的影响。虽然饶勒斯没有象路易·勃朗那样指责“忿激派”主观上的反革命性，但却步阿米里的后尘，谈到他们的活动客观上的反革命性，这与第二国际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力问题的基本主张是完全符合的。

列宁说：“资产阶级革命是否意味着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来完成它呢？”

“孟什维克常常被这种观点弄得糊涂起来。但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资产阶级的（按社会经济内容来讲）解放运动，按动力来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这一运动的动力

可能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⑫

饶勒斯看待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把资产阶级视为这次革命的唯一动力，而把一切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都视为客观上反革命的。

饶勒斯错误地断言，似乎札克·卢不同于代表手工工场工人利益的巴贝夫，^⑬他“反映工人思想的程度远不如反映手工作坊和食利者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嫉妒、痛苦和恐惧心理，这些人厌恶我们今天称之为集体主义的一切”，饶勒斯就以此“证明”“忿激派”的这种“反动作用”。使饶勒斯大为恼火的是札克·卢和其他“忿激派”分子愤怒攻击在革命期间形成的和由于革命而形成的“新”资产阶级。^⑭

然而，尽管饶勒斯对“忿激派”在法国革命期间的作用持错误观点，仍然不容许避而不谈他的著作中的积极方面。为了分析“忿激派”的活动和观点，饶勒斯利用了大量过去被史家所忽视的已发表过的和档案的资料。^⑮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国革命史专家亨利希·库诺夫对“忿激派”也抱有与饶勒斯相同的态度。他认为，“忿激派”运动“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就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具有手工业的特点”；他认为，这一运动“植根于一种小手工业者的特殊绝望心理，他们在新自由条件下迅速膨胀的商工业面前面临被消灭的处境”。因此，库诺夫认为“忿激派”的要求虽然是“半共产主义的”，然而同时首先是“反资本主义的”。^⑯

在研究“忿激派”方面，饶勒斯的直接继承者是20世纪初叶最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专家，巴黎大学教授阿尔伯·马蒂埃（逝世于1932年）。马蒂埃在自己大量的著述中（三卷本的《法国革命史》及其续篇《热月反动》，未写完的

《督政府》，特别是1927年问世的《恐怖时期的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不仅非常重视“忿激派”，而且继饶勒斯之后大量使用新的文献（主要是档案）资料。但是马蒂埃对“忿激派”感兴趣时，也步饶勒斯后尘，对“忿激派”的历史意义做出错误的评价。马蒂埃的“忿激派”观念同饶勒斯、库诺夫的观念一样，对后来的资产阶级史学界，一部分早期的苏联史学家都有不少消极影响。

马蒂埃的政治观点曾多次摇摆，可是正如他本人多次所承认的那样，毕生都是一位“罗伯斯比尔派”。阿尔伯·马蒂埃是“罗伯斯比尔研究会”的创始人，还是《革命年鉴》杂志（后改名为《法国革命史年鉴》）的创始人，并任主编直到逝世，他始终不渝地为自己提出同一个任务：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尔恢复名誉。此外，这位研究1789—1794年革命史的“罗伯斯比尔学派”的鼻祖，竭力无例外地为罗伯斯比尔的一切行动辩解，因此，他当然也象路易·勃朗和阿米里一样，只好把罗伯斯比尔的所有政敌都描绘成反革命者。^⑩如果说，就罗伯斯比尔的右翼政敌吉伦特派和丹东派而言，这一观点或多或少是公正的，那么显而易见，就“不可腐蚀者”（按指罗伯斯比尔——中译者）的左翼政敌而言，这种观点无论有意无意都只能导致最粗暴的历史伪造。马蒂埃的“忿激派”观念正是如此，这非常清楚地反映在他的论恐怖时期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的代表作之中。^⑪

马蒂埃断言，“保王党和吉伦特派在‘忿激派’背后进行活动，为的是挑起不满，如果可能的话，就把公社搞垮。”^⑫因此，马蒂埃得出结论说：“罗伯斯比尔对革命事业做出难以估量的贡献，使之摆脱‘忿激派’的蛊惑”，^⑬不仅如此，似乎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已超脱了阶级的考虑，而只是

为革命利益而行动。^{②①}

俄国无政府主义最大的代表 П·А·克鲁泡特金对“忿激派”的评价同样是不科学的，有害的，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所不能接受的。在1909年的法文初版《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他毫无根据地把“忿激派”描绘成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先驱，认为他们是某种“消费共产主义”的拥护者。^{②②}但是克鲁泡特金与所有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党历史学家不同，他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作为全部历史包括法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提到首位，并试图具体说明“忿激派”观点中的社会主义性质成分，这些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为半个多世纪里还从没有人注意这一方面。同时不应忘记，克鲁泡特金本人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可避免地犯有错误。

在法国托派政论家达尼埃尔·盖兰的著作中也能找到有关“忿激派”的见解。^{②③}盖兰从“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出发，仅仅根据一些已发表的资料从事著述，他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看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萌芽”“同时并存”。^{②④}他完全按照托派的惯常教条把18世纪末法国各阶级都看成是统一的反动群众，以与无产阶级“bras-uns”

（即体力劳动者）相对立。据此，他把被列宁赞誉为有“勇气、本领、和力量”“无情地打击反革命”的^{②⑤}国民公会视为反动的，^{②⑥}把救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起名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他看来，雅各宾专政“旨在反对人民群众”，^{②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多次解释相反，盖兰极力夸大18世纪法国前无产阶级的水平，他把“忿激派”叫做“过早出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家”。^{②⑧}同时，他不惜直接伪造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指出社会小